

INCARCERATION NATIONS

○ ○ ○ ——— [美] 贝兹·卓辛格 / 著 陈岳辰 / 译

A
JOURNEY
TO
JUSTICE
IN PRISONS
AROUND
THE
WORLD

————— Baz Dreisinger ———

○ ○ ○ ○

把他们关起来，
然后呢？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美] 贝兹·卓辛格 / 著 陈岳辰 / 译
Baz Dreisinger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JUSTICE IN PRISONS
AROUND THE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 (美)贝兹·卓辛格著;

陈岳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Justice in Prisons Around the World

ISBN 978 - 7 - 5086 - 7128 - 4

I. ①把… II. ①贝…②陈… III. ①监狱—概况—

世界 IV. ①D9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0936 号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Justice in Prisons Aroun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16 by Baz Dreisin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

著 者: [美] 贝兹·卓辛格

译 者: 陈岳辰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7128 - 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 - 600 - 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 言

此地遗世独立，风俗特异，律法、衣着、礼仪皆自成一格，是活死人居住之处。他们与外界隔绝，生命截然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姆藏古!”警卫操着斯瓦希里语^{〔1〕}咆哮，意思是“白人”。

去你的。

我想保持低调，但白人女性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贫民区，要不被发现难如登天。穿过这道侧门就是卢济拉（Luzira）最高戒备监狱，里头环境混乱不堪，原始收容上限是600名囚犯，但据统计目前人数已达5000，男女老幼皆有，也包括死刑犯。系好藏在外衣下的防弹背心，我朝乌兹冲锋枪接近。

“你要干吗？”对方又嚷嚷。

〔1〕斯瓦希里语（Swahili）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为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编者注

我堆起一脸假笑，嘴里说着“志愿者”“拜托”“先生”“谢谢”。对方还没听完就不耐烦地甩甩手，好像遇上恼人的蚊虫。

五分钟后，我带着另一位志愿者走回来。她已经在当地待了四个月，取得管理机关核发的正式文件，可以合法进入卢济拉监狱，尚未取得正式批准的我只能偷渡。上星期执勤的组长说：“教课啊，那就进去吧。”却什么证件也没给我。

人多好办事。经过不断鞠躬哈腰、不停说拜托和对不起，我们总算低头经过冲锋枪，踏进监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管理人员宿舍，外观就是铁皮屋，后面有武警营房。来到中央大门时，狱警挥手催促我们进去，一群群穿着鲜黄色制服的男囚与我们擦身而过。通过一扇混凝土门，面前竟出现一座小图书馆。

“午安，贝兹教授。”

一整天，或者说应该说一整个礼拜以来，首次有人对我这么客气。乌干达有许多特色，可惜人情味不在其中，旅馆的柜台人员肯礼貌性地点点头我都要谢天谢地了，面露愠色似乎是当地专业表现的一环。愿意亲切接待我的人反而是一名囚犯，名字叫做巴法基·威尔逊，他有很多外号，“威尔逊校长”“波玛区长”等等，源于他是同僚推选的管理员，负责卢济拉监狱的图书馆以及代号“波玛”的牢区。图书馆是由非政府组织“非洲监狱计划”（African Prisons Project）所成立，伦敦和坎帕拉都有该单位的办公室。

“今天过得如何？”威尔逊一如往常露齿而笑，热切地看着我。

他有双全乌干达最和善的眼睛，今年 30 岁，集孱弱老人和活泼男孩两种极端于一身：个头矮小，笑容爽朗，眼神充满朝气，常戴着一顶过大的鲜黄色软帽，活脱像个大男孩；然而，他的动作略显迟缓，尤其说话方式特殊，抑扬顿挫像是在不断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

“还可以，威尔逊。”回答时我不禁嘴角上扬，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对人笑，但这次是发自内心。与他握手之后，我逐一与另外十几个学生握手问好。图书馆的格局方正，学生围着中间的本桌而坐，有的在活页笔记本上涂鸦，有的随意翻书，像是《挪威语入门》《哈姆雷特》《英国乡村导览》等等，不过没认真读。

这堂课的主题是文学创作，威尔逊坐在我左手边朗诵诗词，咬字十分清晰。我昨天先发了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1〕}的作品讲义下去。

历史任你书写篡改，
污蔑扭曲我的模样，
随你践踏我于脚下，
但如尘土我将飞扬。

第一堂课我就请学生写自传，于是知道了威尔逊的故事。他

〔1〕非裔美籍作家、诗人、舞者、演员及歌手。——编者注

出生于乌干达乡下，当地一夫多妻制依旧盛行，家中孩子多达 60 多个。威尔逊尚在襁褓时母亲便过世，他因为遭继母们虐待而逃家。后来犯了罪，由于没钱缴罚金或行贿，只好乖乖坐牢，沦为 3.5 万名乌干达囚犯之一，乌干达的监狱系统超收人数已达上限 6 倍。近百年前的殖民者兴建了这些监狱，原始目的是恫吓人民达成社会控制；但威尔逊入监超过一年，至今尚未接受审判，这情况在此见怪不怪，因为乌干达过半的囚犯都是未审先关。威尔逊算是适应良好，在监狱里面建立了信心，自我改造后成为波玛区长。

想看我绝望崩溃？

想看我垂头丧气？

肩膀似泪滴垂落。

恸哭至声嘶力竭。

学生拍手。“贝兹，我不得不说，”威尔逊感叹，“这首诗除了优美，的确道出我们在狱里的心声。”其他人也沉重地点头。

后来两小时的时间，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家分享自己写的诗，气氛很愉悦。威尔逊写了一首《解放者》，感叹东非各国落入独裁者手里，结尾是期许乌干达能有灿烂的明日。另一个学生的作品开头就是：“艾滋，噢，艾滋，为何要夺走我的家人？”

下了课，我收拾好教材，和威尔逊握手道别，祝他今晚能有

个好梦。

“我在这里没有一天睡得好，应该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他这么说的时侯，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跨出图书馆回到外面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却是维安系统无所不在。恐怖组织肆虐东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类似攻击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看作定时炸弹，无处不设保全警卫，甚至军事岗哨。这里的生活犹如大型障碍赛：第一关是狱警；第二关是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贫民区；第三关则是出租车失约，留我一个人想办法。就算出租车来了，还得和司机讨价还价，即便早上明明才谈判过两轮。坎帕拉的交通、社会氛围，坎帕拉人的那副愠容，还有炸弹检查哨加上金属探测器，以及更多板着脸的警卫，更多冲锋枪和安检程序……我唯有回到饭店才能勉强呼吸。

确实没人说过这趟环球旅程会轻松写意。

是矫治，还是惩罚？

我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全球监狱之旅。

提起这计划时，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习惯别人对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白人、教授，但专门从事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研究，喜爱加勒比海嘉年华，又在监狱授课、推动司法正义，

还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兼职节目制作人，雷鬼音乐迷，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却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以前做过记者、乐评人，当然也是学者，甚至拍过两部纪录片，主题分别是嘻哈文化及司法体系。

挑起别人的好奇，是因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于是游走于诸多不同领域。每回迷上某样东西，我就一头栽进去，譬如爱上牙买加雷鬼乐以后，我无法甘于当个小乐迷，非要钻研到学术研究，为此常常亲自拜访当地。同样狂热的好奇心指引我带着马娅·安杰卢的诗作，来到乌干达监狱。

就我个人成长历程而言，监狱不带浪漫色彩，也不是家常便饭。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多半会接触嘻哈与雷鬼文化。成年后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UNY），虽是公立学校但规模大且极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来自160国、使用127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市一样，用丰富的文化将我熏陶为国际公民。

进修英语博士学位时，我专攻非裔美国人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化中的种族隔阂：界线如何生成，由谁界定，又有谁大胆跨越？为何我有志于此？因为在我看来，种族之见毫无道理。我无法理解为何人类在社会政治诸多层面始终受到这种概念宰制，种族分明是主观认定，而非生物学事实。若就基因来看，不同人种的相同处远多过不同处，但为何大家将这种人为的区别视作理所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心得，成就了我的首部著作，内容为社会史

上真实和虚构的黑白融合案例。

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1]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最动听、最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

[1] 拉斯塔法里运动（Rastafarianism）也译为拉斯塔法里教，因其主轴为黑人的基督信仰，主张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的转世。拉斯塔法里运动带动了雷鬼音乐的发展。——编者注

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 230 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 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 25%；每 31 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戒管制，总数达 700 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 25% 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 51%，抢劫犯仅 4%，杀人犯仅 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 20%，同样高于其

他类别；3 700 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加州坐了 25 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 14 个州未立法禁止。

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 1850 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 6 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 14 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 18 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 94% 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 2015 年报道，美国有“150 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 24~54 岁的黑人男性，有 1/6 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 20% 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 16 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 59 人，英国是 41 人，荷兰为 37 人。2005 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 2 000 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 12 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1〕}冰冷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最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 20 到 30 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2〕}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最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

〔1〕口语中，“纽约上州”泛指除纽约市和长岛地区之外的纽约州。——编者注

〔2〕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画家、插画家，作品风格大半甜美乐观，呈现理想美国。——编者注

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 19 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成形。

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i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 9 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 100 只羊或 10 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 3 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18 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 世纪 50 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最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 世纪 90 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